

軍事社會化的道德形塑與道德認知發展 -軍事道德認同導向與社會認同導向

柯建安

裝甲兵學校

余一鳴

國防大學政治學系

摘 要

受儒家修身的道德觀影響，傳統武德強調將帥的品格修養，忽視軍隊的工具性目標與軍人的本質，這個現象是否仍存在於現代的軍事組織當中？本研究之目的在於瞭解軍事社會化的過程中，個人道德品性與軍事組織價值理念熟輕熟重？藉由道德認知發展的觀點，使用軍事社會化及 DIT 量表進行問卷調查，以階層迴歸方式分析，採北部某軍校二年級 100 員學生為樣本，有效問卷人數為 66 人，研究結果顯示軍事社會化有助於強化軍隊價值特質，轉化以儒家文化為主導的義務論道德認知，轉向以結果為導向的道德認知。足以說明軍事社會化有助於強化軍隊特殊的職業道德，卻降低了社會道德的認同，證明軍隊受工具性目標與職業特質的影響，強化了某些軍事道德價值，而這些價值在某種程度上異於社會道德，使得軍校生在受軍事社會化的過程中，逐漸減緩甚至降低道德認知的發展程度。

關鍵詞：軍事倫理、武德、DIT 量表

The Development of Moral Shape and Cognition of Military Socialization-- Professional Ethics Orientation and Social Identification Orientation

Chien-An Ke

Armor School, Army

Yi-Ming Yu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N. D. U.

Abstract

This research lies in finding out the course of military socialization. The intensive one is the military organization's value and idea comparing with the personal moral character. With the view of cognitive development, regarding 100 cadets of the academy in northern Taiwan as samples, using military socialization and DIT scale to carry out questionnaire investigation, it shows that the deeper the cadets' military socialization is, the lower the social moral identification they have. This reveals that the military socialization facilitates strengthening army's special professional ethics, but slowing down the identification of social morals. It proves that the army is influenced by some specific goals and vocational elements. Military socialization has strengthened some professional ethics value, and the value is different from social morals to a certain extent. It gradually reduces cadets' moral identification development during the process of militarily socialization.,

Keywords : military ethics, Wu De, DIT scale

緒 論

軍事專業倫理長期以來，存在一個矛盾的現象，軍隊運用武（暴）力殺戮危害國家生存發展的人，以維護國家安全。

兵是以不道德為道德的，罪惡莫大過殺人，殺人卻算兵的道德。那種兵式訓練，專門消滅人性，其實人性那能消滅了，那肉慾依然存在，或者更強。一旦暴發，便要姦淫虜掠。我們只能說姦淫虜掠是兵的天職，不能說是兵的不道德。（傅斯年，1980，頁 1563-1564）

軍隊成員來自於社會，道德觀點自然受社會文化及風俗影響。然而為遂行國家社會賦予的任務，發展出「角色分化」的專業軍事倫理觀（Hartle，2004），軍隊從事暴力行為，在憲法的規範下賦予其正當性及合法性，並不違反社會道德，反之，它是社會生存與發展的必要條件。因此，軍隊發展出的特殊專業倫理強調，軍隊的暴力行為是一種崇高無私的道德行為，士兵為了國家社會，犧牲個人安全，甚至以生命維護族群的生存發展。因此，軍隊任務是神聖且崇高的，必須於艱難困苦的環境下完成別人不肯從事的工作，以殺人來達到救人救國的目的。執是之故，軍隊道德的複雜性始終是倫理學所關注的焦點，Walzer（2006）甚至認為，只要軍隊的道德議題能夠解決，那麼倫理學將會出現突破性的發展。顯見，軍隊的道德價值與一般社會價值有相當程度的差異，更凸顯軍隊的道德衝突與現象是探討及解決道德問題的重要途徑與管道。

根據 Franke（1997）的研究，軍隊的暴力特質，不同於一般職業，他特別強調英雄主義、男子氣概及團隊合作，由於軍隊必須藉由集體行為達到戰爭勝利的目的。因應工作環境與指揮管制的需要，軍隊必須維持單一的最高指揮體系，層層節制，由上而下的命令傳達，如身之使臂，使軍隊如此龐大繁雜的組織，能在一個號令之下，齊一步伐，發揮整體力量以完成任務。因此，軍隊為達到命令貫徹，特別重視階級區別，強化階層領導效能與階級服從，強制性地服從上級的命令（Volker，2000）。由於戰爭的暴力特質與職業特性，孕育不同於民間的社會文化與價值。此種軍隊獨有的階級服從價值觀，經由「軍事社會化」（military socialization）管道，企圖讓組織成員認同軍隊的道德規範，合理化自己的不道德行為，經此社會化的管道轉化為認同異於社會道德的軍隊規範。

矛盾的是，為了有效掌握軍隊，文人政府設法借由道德等內在束縛，強化對軍隊的管控，這種「主觀文人控制」，是強化文人政府對軍隊管理的重要機制之

一。在中國，尤其受儒家文化影響，強調由內而外的內在修身思想，滲透於社會文化的各個階層，也深刻影響中國「武德」觀念的發展，特別重視軍事行動的道德性與個人的內在德行。使得傳統的軍事倫理忽視軍隊的工具性與暴力性。本文的目的並非論述軍隊的工具性與道德性孰重，而在於藉由實徵性的研究，發現軍隊倫理與社會價值的分殊性。從社會道德認同的角度而言，軍隊社會化是否降低了原有社會風俗的道德認同，而強化軍隊特有的職業道德認同。相形之下，前者認為軍隊受到職業特性的影響，軍事社會化有助於提升軍隊的暴力特質，出現違反社會道德的職業特質，另一個從傳統儒家的觀點，認為軍隊是社會的構成份子，軍隊道德來自於社會價值，武德觀念受儒家「向裏用力」特質的影響（余一鳴，2010），特別重視軍人道德的培塑，使得軍事教育格外強調品格的養成。軍隊一方面強調暴力行為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卻又得接受品格的陶養，強調軍事專業倫理的建構，卻又擺脫不了傳統文化的束縛。這兩股不同的勢力相作用下，軍校生接受軍事社會化的過程，前者影響力大還是後者較具優勢，是本文所關注的焦點。具體而言，本文希望藉由軍校生的實證調查，驗證軍事社會化與個人道德發展的關係。軍隊的職業社會化過程是強化職業道德的型塑，還是趨向儒家修身的人格方向發展。

一、軍事社會化與道德-軍事道德認同導向

Lizotte 與 Bordua (1980) 認為軍事社會化是服役期間的生活經驗，是軍事組織為形塑組織發展需要的軍事文化與成員，實施一系列有形無形的社會化活動（余一鳴，2003），使受化者接受軍人的「角色規範」，體會軍人的「角色期待」並使之內化為自覺的行為模式（錢淑芬，1996），從而順利地實現軍人的「角色取得」並得到全面的發展過程（許祥文、郭厚存，2003）。因此，軍事社會化是軍事組織透過各種管道，形塑符合需求的組織成員，而成員亦經由組織認可的方式滿足社會需要與個人價值。軍校教育即為典型的軍事社會化機構，希望經由訓練使每個成員的行為態度合乎軍隊的期待與要求。Goffman (1980) 表示軍隊社會化不同於其他組織社會化，是一種「全控機構」(total institution) 的社會化，透過各種有形無形的社會化管道，型塑標準軍人。另外，Mawson (1987) 與 Alcaras (1995a) 則從文化的角度，認為軍事社會化並不侷限於軍隊或軍校的訓練，戰場環境所形成職場特質，也是另一個社會化的主要管道與內容。

軍校為培養出適應戰場及職業環境的軍事人員，藉由軍事社會化等管道，強化軍隊職業特性，其中包含有團隊精神、忠誠、犧牲、無私、艱忍等 (Franke, 2000)。Huntington (1957) 認為軍事環境形塑出的「軍人心態」(military mind)

有別於其他職業特性，具有紀律、嚴格、忍耐力、直覺，但不具彈性。由於戰場的特質與職業的需要，發展出強調英雄主義、團隊榮譽、目標至上的社會化內涵，有別於一般社會價值，很容易發展成為以暴力為主的價值內涵。Dutton、Boyanowsky 與 Bond (2005) 就認為軍隊基於工作環境上的需要，將暴力行為解釋為英雄主義，認為在戰場上殺敵才是個有膽識的軍人。除了職業的特性使然外，工作環境的惡劣，影響正常的心智判斷，也是另一個導致軍隊擁有暴力傾向的重要因素 (Alcaras, 1995b)。

Mawson (1987) 認為在戰場的高度壓力下，使人的知覺、智力及道德感大為降低。這種短暫的失去理智行為即造成暴力事件發生的重要因素。這種有形無形的社會化管道，都直接與間接地促使軍人產生另類的道德價值。而相關的研究也顯示，類似的軍事社會化對於道德認知發展有負面影響，在軍事教育期間即顯現。Franke (1997) 研究後冷戰時期軍事社會化對美國西點軍校生認同影響，發現軍校教育主要在於形塑英雄主義，強化戰場適應適力。因此，對於執行非暴力的「維和行動」(peace keeping operations)，感到有志難伸。顯然軍事教育所謂的價值不同於一般社會，軍人於戰場上奮勇殺敵即為道德。為因應這樣的職業需求，在軍人的人格特質與職業社會化的過程中，即呈現有別於一般社會的道德價值。

Franke (1997) 的研究認為，軍事教育有助於強化「武士精神」(warriorism)，使他們習慣於使用暴力，強調英雄主義，敢於衝鋒陷陣戰場殺敵的人，才是真英雄。Cohrs (2004) 在科索沃戰爭 (Kosovo War) 的研究中發現，戰爭行動之所以忽視負面效應；推卸責任等心態及慣常使用武力解決問題與軍事訓練有關，軍事訓練有助於強化道德疏離而支持軍事行動。Beu 與 Buckley (2004) 研究認為一位成功的軍事指揮官，要能適時的激發部屬的道德疏離，讓部屬克服殺人的心理恐懼與道德自責。軍事領導者若不能有效運用此機制，喚起武士精神，將無法讓士兵克服戰場內心的恐懼與不安。然而，Franke (2000) 在後來研究發現，軍事訓練雖有助於武士精神與愛國主義，但對於其他的觀點則無影響力。也就是說，軍人在軍事社會化過的程中，漸漸形成一套以軍事認知為主的道德認同，這套軍事道德認同認為保國衛民是軍人的天職，在戰場上衝鋒陷陣才是道德的行為，反之，則視為懦夫。因此，在軍事社會化的過程中，軍校或軍事教育必然會形塑軍事價值與其理念，強化軍事專業的道德認同，以適應戰爭法則。

二、儒家文化的武德觀與社會道德認同-社會道德認同導向

「仁者，人也」，人的本質即道德。人類有別於其他物種，在於道德本心 (勞思光, 1975)，孟子曰：「禮、義、廉、恥非外鑠我也，我固有之。」(孟子·告子)

儒家認為道德是人與生俱來的「良知良能」，並不會因為出身的高下、才智的愚劣有所不同。個人內在的道德本能，「求則得之，捨則失之」（孟子·盡心）人與人之間的差異，端視後天「存養擴充」的功夫，由於人的良心善性是不假外求，只要充份發揮人類的本質，經由存心養性的「內在超越」功夫，就能顯現人的道德本性（牟宗三，1974）。尤其以「倫理本位」的中國社會，這種提倡內在存養的工夫，就是基於對道德的認同，認同道德為社會的理想。當主體認同這個理想，就能做到無條件時時遵循，須臾不違（楊國榮，1994）。這種通過人的自覺、向上，以達到人格的完成。亦即要每個人發現自己的德（徐復觀，2004）。換言之，就是要透過個人的道德認同，以完滿社會之發展。

雷海宗（1940）認為受儒家傳統影響，中國自秦漢以後形成無兵文化。以儒家為主體的道德文化，深刻的影響到後世軍事專業倫理的發展（余一鳴，2010），中國武德歷經三個時期的發展，三代以前強調戰爭的正義性、春秋以降百家爭鳴，兵家因戰爭的需求，獲得各國重視，武德朝向務實方向發展，內涵以強調軍人使命為主，秦漢以後儒家文明主導中國文化的發展方向，也滲透到武德的發展當中，軍隊的工具性目的為道德理想所取代，而軍事倫理也以將帥的修養為中心。

儒家認為人雖具有潛在的道德本質，但道德行為的出現，需靠後天的道德修養，「性相近，習相遠」，人的先天本質雖然相近，但若沒有後天的存養擴充，仍無法顯現人的道德價值，道德行為也無法體現。孟子進一步補充環境對道德行為的影響。他說道德良知本來存在於每個人的心中，但又很容易受到外在環境影響而「失其本性」。因此，除了存養擴充個人的良心善性之外，「存天理，滅人欲」，克服後天的物欲，就顯得非常重要。由此可見，先天的本質雖然相近，但後天的環境與個人對道德的認同卻決定了行為的差異。

軍隊文化是社會文化的產物，軍事道德依附於社會道德，在社會道德主體下發展軍隊道德。就 Shweder（1982）的文化心理學來說，道德是社會的建構物，是從團體的經驗中發展出來的，而人們是在認知上建構現實，一個人在感知、理解、思考和行動的許多方式，是在文化中逐漸累積，並由日常實踐中所塑造的，因為不同的人的文化上建構了不同的世界觀。以文化心理學的角度來看，軍隊文化是社會文化下的次文化，軍事文化受社會文化環境影響，軍隊道德觀念必然是由人們生活於外在文化環境中所塑造的。韋政通（1983）表示傳統儒家文化滲透於社會各方面，錢穆（1987）就認為這種德性觀是無往不合，處處可通，所以武功必本於武德，武德是武功的基礎。中國軍人的精神修養，基本著重在智仁勇三達德，其中又以「仁」為主。綜上所述，儒家強調修身德智之思想必然成為軍事價值型塑的核心之一。

余一鳴（2010）分析中國傳統的「武德」發展，發現在傳統的軍人專業倫理

主要受制於傳統儒家文化的道義倫理，及軍事職業需求、戰場生存法則影響，前者以品格與義務為中心，後者強調利益極大化，在價值的整合上出現雙重矛盾的現象。Lu 等人（2002）研究我國軍校的道德發展狀況時發現，軍校生的道德發展與軍事經驗成反比，也就是說軍事化的程度愈深，道德發展的程度愈低落。蔣宗明（2010）則進一步解釋，軍校生的道德發展低落，實際上受到軍隊目的論的道德價值所影響，由原生社會的義務論價值轉向目的論方向發展。由此可見，中國傳統的武德思想內涵主要由兩部份構成，一者以儒家文化為主體的德治修身觀，另外則是以軍事專業為主體的職業倫理觀。前者強調道德理想，後者則有務實工具取向。雖然蔣宗明以質性研究的方式，探討軍校生的道德價值轉換，但並未經過實徵資料的驗證。本研究即企圖從軍事社會化的角度，探討軍隊社會化的道德內涵是否不同於以義務導向的儒家文化。

此外，從 Lu 等人（2002）及蔣宗明（2010）的研究可以發現，傳統武德雖分受義務論的儒家思想及目的論的職業需求影響，但近來有傾向義務論發展的趨勢。

三、道德認知發展的變項

（一）道德發展及 P 分數

在 Kohlberg（1984；1981）的理論中，將道德區分為三個時期六個階段。一個人可能會有一個主要道德序階與多個次要的道德序階，但主要的道德序階並不能代表其判斷的標準，會依實際的狀況而選擇其認為正確的道德序階，只能說越高的道德序階，代表其在判斷的能力上有越高的成熟度。實際上，Kohlberg 的道德發展內涵是以 Rawls（1971）及康德（Kant）的思想為測量基準，他指出「除了正義之外，沒有任何行為準則能夠符合世界各約定成俗的正式概念。」，顯示 Kohlberg 的道德發展理論，是以義務論為先驗的基礎。因此，道德發展測驗分數愈高，代表愈傾向義務論，愈低者愈傾向目的論。

測量道德發展的方式主要有「道德判斷測驗」（Moral Judgment Test；MJT）；「道德判斷訪談法」（Moral Judgment Interview；MJI）；「理想類型評定法」（Ideal Type Rating；ITR）「結構問題評分法」；（Structural Issue Scoring；SIS）；「標準問題評分法」（Standard Issue Scoring；SIS），除了第一種的測量方式之外，其他都是以 Kohlberg 的道德認知發展為主體所發展出來的。Kohlberg 在研究的初期主要以訪談的方式進行道德認知發展的評斷，但流於武斷，後續幾經改良，最後以，Rest（1986a）的「問題界定量表」（Defining Issues Test, DIT）發展的最成熟，累積的研究成果最多，有豐富的資料庫可供參考。因此，本研究中主要採用 DIT 量表的 P 分數作探討分析之依據。

(二) 宗教

在大多數人的觀念中，宗教勸人向善、佈施，並給予一個心靈寄託的精神象徵，影響著人們的行為與判斷，似乎也影響著人們的道德認知（判斷）發展，而在 DIT 中對原則期道德討論的選擇都與自由政治與宗教觀點有顯著的關係（Rest, 1986a; 1986b）。Kohlberg (1981) 表示宗教是屬於道德論題思考的內容部分（俞筱鈞等人譯，1993）。宗教教育（religious instruction）具有多重的目標，涉及傳統文化價值的傳承，以及對人類行為的訓誡，在道德教育如同對 Kohlberg 觀點下的正義教育都是這多重目標中的一個，道德教育在此意義是泛內容（content free）的，為任何宗教所接受。在多數的研究中，宗教與道德認知（判斷）發展並未達顯著相關，而「宗教參與」與道德認知（判斷）發展有相當微弱的關係（呂維理、林文瑛、翁開誠、張鳳燕及單文經譯，2004，頁 455—476）。

由上述，故而將宗教納入變項觀察，以探討宗教是否真的對學生的道德認知（判斷）發展有顯著的影響。

(三) 父（母）教育程度

在單文經（1982）中提到社經地位^{*}對道德成熟度並無顯著差異，而沈六（2001）之研究報告結果中，提到父母教育程度越高，其子女道德發展越成熟，兩者研究成果相左，而從現今的社會現象中，教育普及、知識爆炸與科技日新月異，在報章雜誌、媒體報導與社會新聞都可以看到因口角、意見不合，子弑父（母）、孫因缺錢花用對年長的爺爺奶奶，拳腳相向，社會事件層出不窮。再加上地球村現象，子女吸取知識並非只是單方面從家庭與父母身上學習與成長，父母忙於工作，對子女的身教、言教也日益薄弱，高教育程度的父母是否真的能教育好子女，或者能以身作則、循循善誘使子女受其影響，確實值得探討。

故將其列為觀察變項，以期能透過分析結果與文獻，了解父母的教育程度是否能對子女產生顯著影響。

(四) 性別

由於男性與女性的社會經驗不同，因而在社會技巧、取向與態度上，有系統性的差異。Gilligan (1982) 認為男性的社會發展，以個體性比較突出；而女性的社會發展，較強調個體與個體之間的聯繫性，主張這兩種全然不同的社會歷程導致兩種道德發展的取向—正義取向以男性為主、關懷倫理取向以女性為主，而以正義取向的計分系統會造成女性在道德發展的評分上較低。

而在 Rest、Narvaez、Thoma 與 Bebeau (1984) 針對具有代表性的 56 個以

* 社經地位：參照林綏兩因素社會地位指數（Two-factor of Social Position）方法，將各區分為五個等級的家長「職業水準」與「教育程度」，加權計分，得高、低兩種家庭社經地位。

DIT 為測量工具的研究中(受試者超過 6000 人),同時運用後設分析(meta-analysis procedure)與次級分析法(secondary analysis procedure),估計男女兩性在 DIT 的表現,女性在 DIT 的分數表現,比男性高。而針對所有 56 個研究結果的整體分析結果,顯示性別的變異量之影響小於 0.5%,對 DIT 來說性別差異是不重要的。

綜合上述,將性別虛擬化後(男女對比-女性為參照組)納入變項以求證性別差異是否對道德判斷上也有所差異。

(五) 軍事社會化

根據 Robinson、Lee 與 Carrick 觀察發現英國軍人,由於軍隊的獨特工作—在戰場殺人或被殺—要求它擁有一個特殊的倫理基礎;西點軍校的社群主義倫理的哲學根基在柏拉圖的《共和國》,軍事專業的基本二分法,軍人必須和善地對待其人民,但必須兇殘對待敵人,簡而言之,對一個本質和善與充滿氣質的人而言,不可能是一位好的軍人—書中提到的概念,明顯闡述軍事倫理與「倫理」[†]是有衝突的,同時也影響著軍事倫理的建立(莫大華、段復初、李承禹、郭雪真及駱玲伊譯,2009)。根據洪國元(2004)的研究,警察服務年資越長者,道德成熟度越趨下滑;其次,在呂維理等人(2002)的研究中也發現民間大學 p 分數明顯高於軍校學生,且以我國海軍官校為例,一年級的 p 分數也顯著高於四年級,顯示軍事院校教育整體情境對學生在 DIT 道德判斷推理 p 分數上有負面影響。綜合上述,軍事社會化的程度似乎確實影響著道德成熟度(道德判斷能力),甚至呈現負相關的現象,故而將其納入變項探討。並將性別、宗教及父母親的教育程度列入控制變項,以瞭解軍事社會化對於道德發展的單純主要效果。

根據上述文獻探討,本研究提出以上二個假設:

H1:軍事社會化影響道德發展程度。

H2:軍事社會化是影響道德發展程度的主要來源。

方法

本研究以北部某軍事院校之大學部二年級學生為對象,進行問卷調查,樣本數為 100 人,問卷經兩階段除錯,第一階段為重要性排列錯誤;第二階段為 M 分數大於 8 分,排除無法計分等無效問卷後,有效問卷人數為 66 人。研究前先獲得上級核准,由研究者親自到單位進行實測,實測採集體測驗方式進行,為了提升實問卷信效度,每位參與填答者均獲得一份精美禮品。問卷回收後以人工方

[†] 倫理:社會規範與法律等面向

式鍵入電腦進行 SPSS 統計分析，其中受試者—男性佔 75.8%、女性為 24.2%；有宗教信仰者佔 53%、無宗教信仰者為 47%；母親教育程度國中以下為 30.3%、高中為 57.6%、大學為 9.1%及研究所學歷為 3%；父親教育程度國中以下為 37.9%、高中為 39.4%、大學為 12.1%及研究所學歷為 10.6%。為瞭解軍事社會化對道德認知發展的影響力，以迴歸分析方式進行，其中性別與宗教信仰由於非等矩尺度，在分析前已先行轉為虛擬變項。以下針對測量工具進行說明。

一、軍事社會化量表

本量表主要採用余一鳴、顏志龍（2009）發展的軍事社會化量表，該量表主要依據 Chao, O Leary-Kelly, Wolf, Klein 與 Garnder 等人（1994）所編製的組織社會化量表改編而成，經由實際於軍隊中施測信度達.90 以上。本量表在測量軍校生於受軍事教育（環境）與課程後，從而形成的軍事社會化程度。此量表採 Likert 式 6 點量表形式，區分「非常不同意」、「不同意」、「部分不同意」、「部分同意」、「同意」、「非常同意」六個等級，共 33 題，其中有 9 題反向題（第 2、7、8、9、10、18、19、20、21 題）構成軍事社會化一個面向。

在計分方面，正向敘述題從「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六個等級分別給予 1 分、2 分、3 分、4 分、5 分、6 分；反向敘述題從「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六個等級分別給予 6 分、5 分、4 分、3 分、2 分、1 分，將各題得分加起來，即為受試者在該量表的分數。得分愈高表代軍事社會化的程度愈深。

二、界定問題測驗（Defining Issues Test；DIT）

根據 Kohlberg 的道德認知發展理論發展的量表，主要有 Kohlberg（1984）的「標準問題評分法（Standard Issue Scoring；SIS）」；Rest（1986a）的「界定問題測驗（Defining Issue Test；DIT）」及 Lind（1984）的「道德判斷測驗」（Moral Judgment Test；MJT）等，其中以 Rest 發展的道德判斷工具，至今一直為學者使用，由於該量表使用上較其他幾種容易，亦有較高之信度。因此，廣為學術研究運（採）用，也累積多筆資料庫。DIT 量表又區分為二種版本，DIT-1 量表以 P 分數，而 DIT-2 量表以 N2 為道德認知發展程度的指標。本研究採用的是 DIT-1 量表的 P 分數。

Rest 發展的道德判斷工具，深受學者青睞，在華人社會早在廿世紀八〇年代即出現相關研究。單文經（1982）對國中生與高中生的研究發現，國中生與高中生的 P 分數達顯著差異，且用 DIT 以項目分析進行內部一致性的考驗發現，具

同一階段特性的各題目間，成正相關；楊銀興（1987）對小學生的研究中發現，間隔 19 天的重測信度為 0.52。Rest（1986b）也提供大量的研究證據來證明 DIT 是具有良好的信效度之測驗，他以 19 名九年級學生為對象，隔兩周時施重測，結果發現 P 分數之重測相關係數為 0.81，本研究信度為 $\alpha .79$ 。Rest、Narvaez、Thoma 及 Bebeau（2000）研究指出，DIT 有良好的內外信效度。綜合上述，DIT 經過這麼多年的發展與實證研究，證明是一份具有信效度的研究工具，故本研究選定 DIT 作為測量道德成熟度與道德序階的工具。

馬慶強（1997）根據 Kohlberg（1984）的理論，參考中國傳統的儒學思想，對道德認知發展量表進行修正，並在 DIT 基量表的基礎上增加第六（仁與普遍倫理原則）及七階段（自然的和諧），使得 DIT 更具義務論的特色。因此，本研究以 DIT 量表做為測量儒家義務思想程度之量表，分數愈高代表愈偏向義務論（即社會認同導向）；反之，則傾向目的論（即軍事認同導向），用以瞭解目前軍校生受軍事社會化影響之後，在倫理價值取向上的變化。

由於 DIT 量表的計分操作頗為複雜，至今國內仍無相關明確的資料可資參考，以下即針對量表的內容及 P 分數的計算方式加以說明：

（一）問卷內容簡介

本問卷有六個故事，每則故事有十二個題目。每則故事敘述一個具有道德兩難的道德困境，而十二個題目敘述一個故事主角可能考慮的事項，由於問卷編製是以初中教育程度以上為對象，由於初中程度已具相當文字運用能力，此外，根據以往的結果顯示，青少年時期均已脫離第 1 階段，因此捨棄了階段 1 的題目，並將階段 5 劃分成 5A「社會契約道德導向」（the morality of social contract）與 5B「直覺的人道主義道德導向」（the morality of intuitive humanism）兩種類型的題目，另外增加 A 為「反建制」（Anti-establishment）的題目，這個導向的道德判斷相當階段 4 和 5 之間，故可稱為 4 1/2 階段和 M「係為無意義」（Meaningless）的題目兩種特性的題目。因此，共有階段 2、3、4、5A、5B、6、A、M 等八種特性的題目，茲將針對計分方式，做詳細說明：

1. 問卷作答方式分為兩部分

- （1）重要性評定（rating）：要求受試者就故事下每個題目，依個人的考慮判斷，給予「最重要」、「重要」、「尚重要」、「不重要」、「毫不重要」五個程度作評定。
- （2）重要性排列（ranking）：要求受試者把十二個題目視為一組，依「第一重要」、「第二重要」、「第三重要」、「第四重要」作等級排列。
- （3）在說明作答方式前，應特別提醒受試者在作答第二部分重要性排列，須依第一部分重要性評定中，就「最重要」所評定的題目先行排列，

然後再就「重要」所評定的題目排列，依序由重要性的大至小而排列，不可由小至大而排列，以避免倒錯的現象發生。

(二) DIT 問卷計分方式

本問卷以受試者在重要性排列部分的作答，經過加權而計分，依三個步驟進行：1.剔除問卷 2.求取 P 分數 3.確定受試者的道德階段。

1.剔除問卷：

為了解受試者的作答是否可信，必須進行一致性的檢查，以剔除廢卷。Rest 建議：(1) 凡是在第一、第二重要性排列部分的題目，有兩則故事（含）以上，或六則故事合計有八個題目（含）以上有倒錯現象時，此問卷為廢卷，而不予計分。(2) 凡是受試者在任兩則故事中，有九個（含）以上的題目評定在同一等級，亦視為廢卷。(3) 各故事的 M 分數相加所得，不得超過八分。

2.求取 P 分數：

P 分數代表受試者在各故事原則期中 5A、5B、6 三個階段所得的分數，其代表受試者的道德判斷能力與道德成熟度，實際道德判斷乃依據現實情境與環境壓力....等情況，而使其作出對應的判斷，並非分數高就會做出較符合道德的判斷。

P 分數的求取以下列步驟計算：

(1) 準備分數登記表（表 1），只計「重要性排列」的部分。

表 1 分數登記表

階段 故事	2	3	4	5A	5B	6	A	M	P
故事一									
故事二									
故事三									
故事四									
故事五									
故事六									
合計									

資料來源：單文經，1982：39

(2) 核對計分鑰（表 2），依「重要性排列」找出每一題所代表的階段，依序填入 4、3、2、1（EX：故事一，受試者將題目 10 列為第一重要，依計分鑰故事一題目 10，為 5A，則在表 1 故事 1，5A 的格子填入加

權分數 4；第二重要的加權分數為 3；第三重要的加權分數為 2；第四重要的加權分數為 1)。

(3) 各故事 P 分數，是將 5A、5B、6 三個階段的分數相加，除以 60（六個故事加權分數滿分為 $(4+3+2+1) * 6=60$ ），乘以 100 之分數，而將各故事 P 分數相加，即為受試者的 P 分數。

P 分數得分愈高代表道德發展愈成熟，反之，則愈低。

表 2 計分鑰

故事 \ 題目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故事一	4	3	2	M	3	4	M	6	A	5A	3	5A
故事二	3	4	A	4	6	M	3	4	3	4	5A	5A
故事三	3	4	A	2	5A	M	3	6	4	5B	4	5A
故事四	4	4	2	4	M	5A	3	3	5B	1	4	3
故事五	4	4	3	2	6	A	5A	5A	5B	3	4	3
故事六	3	4	2	5A	5A	3	6	4	3	A	5B	4

資料來源：單文經，1982：39

結果

由於 DIT 測量依據 Kohlberg (1984) 的道德認知發展理論而來，其中 P 分數的高低即代表認知發展程度，P 分愈高道德認知發展的程度愈高，同時代表愈具義務論的道德傾向。因此，藉由軍校生在軍事社會化過程中 P 分數高低之變化，以判定軍事社會化對道德認知發展程度之正負向影響。此外，在過去的研究當中發現，影響道德認知發展主要有性別、宗教及父母的教育程度等，在軍隊的研究當中亦發現性別及有無宗教信仰是軍人道德的重要因素（例如，Hancock, 1991；Barriga, 2001；Franke, 1999）。因此，本研究將性別、宗教及父母的教育程度當作控制變項，以多元迴歸方式比較軍事社會化對道德認知發展影響之效果。結果發現，宗教與父母教育程度並不具顯著影響力，主要影響力來自於性別及軍事社會化，尤其軍事社會化對於 P 分數可解釋變異量最高。分析如下：

由表 3 可以得知在 P 分數與性別及軍事社會化程度呈現相關，顯示男性在道德判斷的分數上高於女性，及軍校生受軍事社會化的程度愈高，道德認知發展程度愈低，兩者呈現負相關。而與其他自變項均未達顯著相關。

表 3 相關矩陣表

P分數	1.母親教育程度	2.父親教育程度	3.軍事社會化程度	4.性別	5.宗教
1	-.169				
2	-.193	.603			
3	-.892***	.139	.163		
4	.291**	.129	.010	-.309**	
5	-.143	.073	.079	.203	.034

* $p < .05$ ** $p < .01$ *** $p < .001$

為瞭解軍事社會化程度對於軍校生實際的道德影響，進一步採用階層迴歸分析，先將四個自變項以強迫法進行迴歸方程式的分析，結果發現整體的 R^2 高達.80，顯示整體模型可解釋道德認知發展達 80%的變異量，由於樣本數少，採用調整後之 R^2 ，但亦高達 78%的解釋量。觀察模式二在加入軍事社會化之後， ΔR^2 增加 65%的解釋力。整體模式考驗亦達顯著水準 ($F_{(5)} = 194.78, p < .001$)。在第一個模式四個自變項中僅性別具有影響力，模型解釋力僅 15% ($R^2 = .15$)，但第二階再加入軍事社會化程度後，則性別的影響力被軍事社會化程度吸納，性別不再呈現顯著影響力，同時整體的影響力增加 65% ($\Delta R^2 = .65$)，顯見模式中的變量主要來自於軍事社會化的貢獻。

表 4 層階迴歸分析摘要表

自變項	Model 1		Model 2	
	β	t	β	t
母親教育程度	.119	2.639	.001	.342
父親教育程度	.078	-1.148	-.011	.680
性別	-.332	-9.17**	-.060	-.429
宗教	.199	-.696	.082	-.468
軍事社會化			-.884	-13.956**
R^2	.15		.80	
Adj R^2	.10		.78	
ΔR^2	.15		.65	
F test	2.78*		194.78***	

* $p < .05$ ** $p < .01$ *** $p < .001$

討論

綜合而言，本研究主要發現如下：(一) 性別、宗教及父母親的教育程度對於軍校生的道德發展並無顯著影響力；(二) 軍校生的道德認知能力主要來自於軍事社會化的影響，且影響力愈高道德發展能力愈低。根據上述結果研究者探討如下：

一、軍事社會化強化軍事道德認同導向

研究結果發展軍事社會化抑制道德認知發展，軍隊社會化的內涵在於強化軍事道德認同導向，抑制以社會認同導向。然而，這個效果是否受限於小樣本威脅研究的外在效度。實際上，Lu 等人 (2002) 以 Kohlberg 的道德認知發展為理論框架，進行國內三軍 (陸、海、空) 官校道德發展的研究，該研究發現年級愈高道德認知發展的程度愈低，比較美國海軍官校的研究，亦出現同樣的情形。Lu 認為這樣的研究結果可能是 Kohlberg 的道德認知發展，強調個人一生當中道德認知的長期歷程，研究僅短期觀察一至四年級的軍校生，在整個人的道德發展上顯的微不足道，並無法正確觀察軍人道德發展的全貌。由於本研究想要進一步的瞭解，這樣的研究是否純屬統計上的偶然，改以軍事社會化量表進行更精確的測量，結果與 Lu 等人及美國海軍官校的研究不謀而合。然而，本研究認為軍事社會化，使得軍校生的道德價值由一般的社會道德認同，轉向以結果為導向的道德價值 (余一鳴、顏志龍，2010)。由於，軍事社會化強調軍隊專業倫理的型塑，在內涵上不同於一般社會倫理價值，因而抑制的義務性的道德認知發展，使得軍校四年級學生的道德認知低於一年級。事實上，由於軍隊的道德教育以結果論為內涵，不同於一般社會的義務論倫理。採用 Kohlberg 的義務論為導向的測量，自然出現軍校生受軍事社會化的程度愈深，道德認知發展愈低落的情形。

二、職業道德與道德倒退？

根據上述研究得知軍事社會化的內容，以強化軍事道德認同導向為主，對於以儒家文化為主體的社會道德認同難免產生部份影響，由於社會化的道德內容有所差異，因此，軍隊必須藉由道德疏離機制，合理化軍隊的道德內涵與行為。蔣宗明 (2010) 軍校的軍事社會化過程，將原生社會的道德價值內涵進行轉化，將原有公平轉化為階級性的平等，強調跨時間的公平，而非一般社會認知的同一空間概念下的公平，經由強制性的道德價值轉化，形塑軍事社會所需求的道德價值，團結、服

從、榮譽、忠誠等。因此，軍隊並非將原生社會不道德的事物視為道德，而是軍隊有其特殊的道德需求，形成不同於社會的道德內涵。相形之下，軍事社會化導致道德認知的弱化，並非否定儒家文化的修身價值，反而是經由軍事社會化的過程中，融入軍事社會的特質當中，強調「不成功便成仁」；「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也。」的精神。因此，藉由 DIT 量表所測量出來的結果，並不能歸結於軍事社會化導致道德知識倒退。應當視為道德認知內涵的轉變。事實上，Kohlberg 的道德認知發展理論，本即有跨文化（馬慶強，1997）及性別（Gilligan，1982）上的限制。當研究以此架構進行測量時，即出現傅斯年（1980）所謂的道德倒退現象。經由本研究結果，再次證明，軍事社會化有助於強化軍隊成員軍事價值，這種特殊的價值由於不同於民間社會，因此產生道德倒退的現象，若從軍事價值形塑的角度而言，軍事社會化所塑造的道德價值，有助於提升官兵於戰場上的適應力，雖然這些價值觀未必適用於一般社會，但卻是職業社會化產生的必然效應。

三、社會道德認同與自我道德認同衝突

軍隊透過社會化歷程，將軍隊的核心價值灌輸給新進人員，使新進人員展現出軍隊所期待的價值、規範及行為型態。軍隊經由徵募管道，徵集不同背景的社會成員，經由集體社會化的方式，形塑符合軍隊需求的組織成員。根據 Colby 與 Damon（1995）的道德自我解釋理論，認為個人的道德來自於自我道德與社會道德兩部份，這兩個內涵融合的愈好，道德行為出現的機率就愈高。但個人自我道德認同與社會道德認同衝突時，會出現什麼樣的狀況。也就是當次文化的道德認同與原始道德認同不一致時，個人如何建構自我的道德認同，當自律與他律發生矛盾時個人如何自處？本研究初步證實，當次文化與社會化的道德內涵產生衝突時，次文化利用組織的再社會化型塑道德認同。傳統中國武德，雖然長期受儒家文化的影響，形成兵儒合流，甚至於以儒統兵的文化心理現象，但經由本研究證實，軍事社會化有助於強化軍隊價值特質，轉化以儒家文化為主導的義務論道德認知，轉向以結果為導向的道德認知。由此可見，軍事院校雖受儒家文化影響，軍校的教育道德教育內涵，仍以兵家的結果論為主，當軍校生進入軍校後，受軍事社會化的影響出現道德認知的轉向，使得軍事社會化程度愈高，道德認知發展愈低。

四、研究限制

（一）由於本研究對象僅限於軍校生，沒有針對非軍校生的道德認知發展情

形進行調查，雖然利用軍事社會化程度量表，驗證軍校生的道德認知高低實受軍事社會化程度的影響。但是並非就讀軍校者，本身在道德認知程度即與一般未就讀軍校有所差異，而非軍事社會化產生的影響，建議後續的研究者，可以納入非就讀軍校的大學生，控制外在變項對研究的干擾。

(二) 由於 DIT 測驗對受試者的要求較高，問卷複雜度與作答時在模擬情境時亦要注意重要性排列，出現誤答或排列錯誤的機率頗高。這個情境也在本研究當中發現，受試 100 員的軍校生，經過分析後僅 66 員通過重要性排列，致使後續分析樣本大量流失。其次，雖然 DIT 量表具有不錯的外在效度，但本研究並未進行相關的檢測，因此，在研究結果的推論上要格外注意。建議後續研究者可考慮採用 DIT-2 量表提高問卷的使用率，同時進行外在效度之檢測以提升研究結果精確度。

五、未來研究建議

(一) 進行長期的追蹤調查

由於國外的研究實證，多以縱向研究為主甚至長達數十年，建議可以針對軍事院校一至四年級學生或從一年級追蹤至四年級，從中了解軍事院校學生道德成熟度的發展狀況，從事分析比較後用以修正、精進軍事院校倫理與德行課程方針與規劃。其次，次文化道德認同與心理轉折如何產生，則有必要借由長期追蹤觀察，瞭解軍隊道德疏離產生的心理歷程，也有助於瞭解道德認同，在軍事社會化架構下的交互關係，並彌補理論之不足，協助構建更為縝密的道德認同理論。另外，軍事社會化所形塑的道德價值，有沒有情境上的區別，會不會在戰時與平時的道德價值有所差異，其次，道德義務論與結果論在情境上有會扮演什麼樣的角色，這些問題都是後續研究值得深入討探的議題。

(二) 「兩難困境教學模式」與「道德成熟度」的相關研究

國外的民主先進國家，日益重視軍事倫理道德對其軍事人員的影響，其中實施方式眾多，大體不離以案例討論與實境模擬討論方式，而兩難困境教學模式是非常適用的。依國外研究，道德困境教學模式可以有效提升道德認知與判斷能力，建議可以用準實驗研究模式，以軍事院校學生做實驗與控制組，用 DIT 進行前測後，實驗組給予一系列的軍事倫理課程與道德困境的討論，控制組則不給予軍事倫理課程與道德困境的討論，建議課程在 3-12 週左右，完成後再以 DIT 測量是否有助於道德成熟度的提升。

參考文獻

- 沈六(2001)。**道德發展與家庭脈絡之研究**。國科會計畫(編號: NSC89-2413-H003-059)。
- 牟宗三(1974)。**中國哲學特質**。台北: 學生書局。
- 余一鳴(2003)。**軍隊社會化的理論與實際**。**復興崗學報**, 77, 219-245。
- 余一鳴(2010)。**中國武德觀念之初探**。軍人武德與品格教育學術研討會宣讀之論文。(北投: 復興崗)。
- 余一鳴、顏志龍(2009)。**初階軍官的道德認同與疏離(I)**。國科會計畫(編號: NSC98-2410-H-606-008)。
- 呂維理、汪治平、張聖德、楊天行、李志宏、楊穎堅及郝仲芸(2002)。**海軍官校軍事倫理教育情境初探**。第九屆三軍官校基礎學術研討會宣讀之論文。(高雄: 空軍官校)。
- 呂維理、林文瑛、翁開誠、張鳳燕及單文經等譯(2004)。**道德發展研究與理論之進展**。台北: 心理出版社。Rest, J. (1986): *Moral Development: Advances in Research and Theory*。
- 洪國元(2004)。**警察大學學生道德教育之內容與發展-郭爾保道德認知發展理論之應用**。中央警察大學行政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 俞筱均、林文瑛、郭靜晃、單文經、曾端真、葉光輝及蘇建文等譯(1993)。**道德發展: 柯爾堡的薪傳**。台北: 洪葉文化。Kuhmerker, Lisa、Gielen, Uwe & Hayes, Richard L. (1992): *The Kohlberg Legacy of the helping professions*。
- 莫大華、段復初、李承禹、郭雪真及駱玲伊等譯(2009)。**軍隊的倫理教育**。台北市: 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Paul Robinson, Nigel De Lee & Don Carrick (2008): *Ethics Education in the Military*。
- 韋政通(1983)。**中國文化概論**。台北市: 水牛出版社。
- 徐復觀(2004)。**孔子德治思想發微, 中國思想史論集**。上海: 世紀出版社。
- 馬慶強(1997)。**中國人之感性與認知方面的道德發展: 一個七階段發展理論**。載於楊國樞(主編): **中國人的思維方式**(Vol.7, 頁 166-212)。台北市: 桂冠。
- 單文經(1982)。**道德教育初探**。高雄: 復文。
- 許祥文、郭厚存(2003)。**軍人社會化與軍人意識的培養**。**社會**, 12, 48-50。
- 傅斯年(1980)。**傅斯年全集**。台北市: 聯經出版社。
- 勞思光(1975)。**中國哲學史**。台北: 華世出版社。
- 單文經(1982)。**道德教育初探**。高雄市: 復文出版社。

- 楊國榮 (1994)。善的歷程-儒家價值體系的歷史衍化及其現代轉換。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 楊銀興 (1987)。國小學生場地獨立性、內外控信念與道德判斷的關係。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雷海宗 (1940)。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北京: 商務印書館。
- 蔣宗明 (2010)。軍校生道德認同歷程之研究。國防大學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
- 錢淑芬 (1996)。軍官養成組織「軍事社會化」之研究。中正理工學院軍事社會科學學術研討會宣讀之論文。(桃園: 中正嶺)。
- 錢穆 (1987)。中國武德與武功, 中華文化十二講 (頁 125-134)。台北市: 東大圖書公司。
- Alcaras, D. (1995a). *Military socialization during the Vietnam era: differentiated aspects of trauma and conditioned respons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 Alcaras, D. (1995b). *Military socialization during the Vietnam era: Differentiated aspects of trauma and conditioned responses*. Ph.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 Barriga, A., Morrison, E., Liao, A., & Gibbs, J. (2001). Moral cognition: Explaining the gender difference in antisocial behavior. *Merrill Palmer Quarterly*, 47(4), 532-562.
- Beu, D. S., & Buckley, M. R. (2004). This is war: How the politically astute achieve crimes of obedience through the use of moral disengagement. *The Leadership Quarterly*, 15(4), 551-568.
- Chao, G. T., O Leary-Kelly, A. M., Wolf, S., Klein, H. J., & Gardner, P. D. (1994). Organizational socialization: Its contents and consequences.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79(5), 730.
- Cohrs, J., & Moschner, B. (2002). Zur kognitiven Konstruktion von (Un-)Gerechtigkeit militärischer Gewalt: Die moralische Beurteilung des Kosovo-Kriegs. *Zeitschrift für Sozialpsychologie*, 33(1), 13-24.
- Colby, A., & Damon, W. (1995). The development of extraordinary commitment. In M. Killen & D. Hart (Eds.), *Morality in everyday life : 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s* (pp. 342-370).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utton, D. G., Boyanowsky, E. O., & Bond, M. H. (2005). Extreme mass homicide: From military massacre to genocide. *Aggression and Violent Behavior*, 10(4), 437-473.

- Franke, C. (1997). *It takes a soldier: The effects of post-Cold War military socialization on the identity of West Point cadets*. Ph.D. doctoral dissertation, Syracuse University, New York.
- Franke, V. C. (1999). *Preparing for peace: military identity, value orientations, and professional military education*. Westport, CT: 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
- Franke, C. (2000). Duty, honor, country: The social identity of West Point cadets. *Armed Forces and Society*, 26(2), 175.
- Gilligan, C. (1982). *In a different voic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Goffman, J. M. (1980). *Batterer's Anonymous: Mutual Support Counseling for Woman-Batterers*, Coalition for the prevention of Abuse of Women and Children, Redlands, Calif.
- Hartle, A. (2004). *Moral Issues in Military Decision Making*, Lexington, Kentucky: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 Hancock, C. (1991). *Women officers at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cademy: A study of acceptance patterns and coping mechanisms*.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 North Carolina.
- Huntington, S. P. (1957). *The soldier and the state : the theory and politics of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Cambridge ::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Kohlberg, L. (1984). *The psychology of moral development: The nature and validity of moral stages*. New York: Harpercollins College Div.
- Kohlberg, L. A. (Ed.). (1981). *The psychology of moral development: Essays on moral development* (Vol. 2). New York, itd: Harper and Row.
- Lizotte, A., & Bordua, D. (1980). Military socialization, childhood socialization and current situation: veteran's firearm ownership. *J Polit Milit Sociol*, 8, 243-256.
- Lu, W. -L., Chang, F. -Y., Chang, S. -T., Hao, J. -Y., Yang, T. -H., Wang C. -P., Lee, C. -H., and Yang, Y. -J. (2002). *A Preliminary Survey on the Cadets' Moral Reasoning and Attitudes toward Authoritarianism, Collectivism, and Filial Piety of Two Military Academies in Taiwa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Joint Service Conference on Professional Ethics, Washington DC. USA.
- Mawson, A. (1987). *Transient criminality: A model of stress-induced crime*. New York: Praeger
- Rawls, J. (1971). *A theory of justice*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Rest, J. (1986a). *DIT Manual: Manual for the Defining Issues Test*.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Rest, J. (1986b). *Moral development: Advances in theory and research*. New York: Praeger.

Rest, J., Narvaez, D., Thoma, S., & Bebeau, M. (2000). A neo-Kohlbergian approach to morality research. *Journal of Moral Education*, 29(4), 381-395.

Shweder, R. A., & Bourne, E. J. (1982). Does the concept of person vary cross-culturally? In Marsella, A. J. (et al.), *Cultural Conceptions of Mental Health and Therapy*. New York: Boston, 97~137.

Volker, C. F. (2000). Duty, honor, country: The social identity of West Point cadets. *Armed Forces and Society*, 26(2), 175.

Walzer, M. (2006). *Just and unjust wars: A moral argument with historical illustrations*. New York: Basic Books.

(投稿日期：99年6月18日；採用日期：99年8月27日)

軍事社會化的道德形塑與道德認知發展-軍事道德認同導向與社會認同導向